

近世中日通商关系史研究

贸易模式的转换与区域秩序的变动

王来特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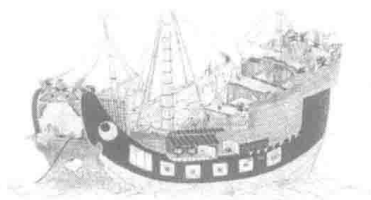
海外借

近世中日通商关系史研究

贸易模式的转换与区域秩序的变动

王来特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世中日通商关系史研究:贸易模式的转换与区域秩序的变动/王来特著.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7-302-51362-9

I. ①近… II. ①王… III. ①中日关系—双边贸易—贸易史—研究—16世纪—18
世纪 IV. ①F752.7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2182号

责任编辑:马庆洲

封面设计:曲晓华

责任校对:王淑云

责任印制:丛怀宇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三河市吉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65mm×240mm 印 张:23.25

字 数:354千字

版 次:2018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88.00元

产品编号:078982-01



序言

PREFACE

王来特博士的专著《近世中日通商关系史研究：贸易模式的转换与区域秩序的变动》（以下简称“王著”）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作为该书写作之整个过程的见证者，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向读者介绍王著的著述缘起、核心要义以及为此而大费披阅增删的过程。

9年前，来特在与我商量博士论文选题时，对话题中登场的日本江户时期重要人物新井白石及其“信牌贸易”政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几番交流后，他决定去挑战中日近世阶段不易厘清的难题：两国的贸易问题。之所以称之为“难题”，首先是因为这一时期存留的相关史料颇为散碎，整理不易，解读更难。其次则因为既有的研究虽在若干专题做了精深研究，但对这一历史阶段进行整体把握和分析者还不多见。并且，考察近世中日贸易和政治交涉，已经大大超出了我们所熟悉的思想史本身的射程，所以在接下来的交流过程中，我只能在框架和学理上跟作者保持沟通，并设法在论文撰写上为他创造一些相对好的条件。

2011年至2012年，来特以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身份到京都日文研“联培”，合作导师为刘建辉教授。据建辉教授讲，那一年来特努力穷尽式地搜寻与研究课题有关的资料，还亲赴长崎并住在那里，去查阅原始档案，去踏查“唐人”遗迹，去精研荷兰商馆。于是，我看到了他博士论文附录中

中日贸易账簿手写本的整理以及在此基础上归纳出的数据。

王著以 14 世纪 70 年代至 18 世纪中期的中国与日本的通商关系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了这一时期中日交涉体制、贸易模式的建立、演化、解体和重新构筑的过程。作者的研究可以简约表述为：这一阶段，中日官方主导与管控的双边贸易经历了从“朝贡—勘合贸易”到“互市贸易”或者更确切说是“往市贸易”的变化，这是通商模式的转变，也是中日政治经济关系结构性变动的反映。一部好的研究著作，学术史的梳理是前提中的前提。在作者讨论的脉络里，费正清的“朝贡体制论”自然是要面对的问题。如所周知，费正清的论点曾被奉为圭臬，而近年则在中国研究领域备受质疑，本书作者充分了解这些学术动向，却不简单跟从通说，而是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认为费正清的分析框架在德川日本对外关系研究中仍不失其有效性。某种意义上，“朝贡体制”在日本的复制和再生产，已为王著的展开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与此相关，滨下武志的“朝贡贸易体制论”曾明确指出过东亚国际关系和区域秩序具有的多层、多元和多极化的特点，而这一点，事实上也是王著所强调的重要内容。他能对“近世”概念提出新解，还在一定层面上受到了岸本美绪的启示，即把中国、日本以及东亚的近世定义为一个“过程”，一个“面对共通的问题各地域各自进行回答”的过程。王著受此启发，认为“近世”的作为历史时段的划分可以根据研究内容来界定，而 14 世纪后期至 18 世纪中期的中国与日本所面对的重要共通问题，无疑是以贸易为主线的。王著对前辈学者的工作表示了充分的敬意，同时也努力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推进。在作者看来，岩井茂树的“互市制度论”试图通过对滨下“朝贡贸易体制论”的批判和超越，去拔高“互市”的意义和作用，自有其学术贡献，但具体到中日通商关系，则岩井对清日之间没有直接官方交涉的“互市”的形成原因，以及清日贸易性质的解说，则均不无可质疑商榷之处。在对以往研究进行认真梳理和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王著明确地将清、日贸易定性为“往市型的互市贸易”，认为，清、日间的这种贸易，绝非一般意义的民间自由贸易，而是在双方政府严格控制之下，具有深度政治背景的“国家管制型贸易”。这一贸易模式并非出自清朝方面的政策意图，而是德川日本沿用了幕府初期的对华交涉政策，将交涉对象限定为赴日中国商人，由此

而形成的以排拒清朝政治权威为目的的贸易格局。在这样的通商关系中，日本掌握了更多的主导权，中日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动。岩井茂树的“互市制度论”过度强调清朝对外贸易的“自由性”以及互市制度在政策上的主动性，将中国在东亚海域渐渐失去主导权的历史简单地定义为区域繁荣与和平的基础，这在一定意义上讲，已经忽略甚至遮蔽了清、日双方政府对贸易的政治介入程度和目的本身。

细审王著，我们还可从中读出作者的具体创见和学术贡献。

首先，关于明朝初期的对日交涉，日本学界的主流观点多以“僵硬”评之，认为朱元璋不接受来自日本的朝贡是因其固守华夷意识，这一长期主导近世中日关系研究话语权的表述，已在无声无息中将历史上中日交涉中的问题和责任完全推到了中国一方。本书作者则认为对日交涉是明太祖朱元璋构建区域帝国及重建东亚海域秩序的一环，其交涉政策既有原则又具灵活性，并指出：对于14世纪末尚处于动荡中的东亚海域来说，明朝推行的秩序在客观上起到了维护稳定、促进区域良性发展统合的作用，见解新颖且考证详实，其中对所谓“日本国王”怀良之实像和虚像的分析细致缜密，尤见精彩。

其次，王著注意到，15至17世纪，东亚海域发生了剧烈的变动。由明王朝所牵动的多极化海域贸易网络的形成，反而动摇了明王朝的中心性主导地位，致使中国经济对外部的依存上升，而作为东亚主要产银国的日本则乘机获得了区域贸易的主动位置。丰臣秀吉对中国的军事挑战，是在这样的区域背景下展开的。德川家康对丰臣秀吉的区域政策虽有调整，但更多是继承，故既谋求与中国进行贸易，又排拒中国的政治权威，一直回避、拒绝与中国官方的直接接触，实际上以日本官方管制的“往市贸易”模式，对勘合贸易体制进行结构性的改变。据此，王著认为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华交涉，并不适合用以往一些权威学者所说的“善邻友好”或“回归贡市贸易”进行概括，可谓持论有据。

第三，德川日本的对外贸易管制，既出自对经济利益的计算，同时也有政治层面的考量。王著敏锐地观察到，在推行日本型区域秩序的过程中，幕府将政治权威附着于贸易事务，这导致中日在政治和思想层面产生矛盾，但没有官方接触的交涉方式，又为化解矛盾提供了回旋的余地。另

一方面，清朝前期的皇帝对朝贡体制的适用范围以及东亚区域的时局均有准确的认识，在对日交涉事务中发生与传统意识形态相矛盾的事件时，他们会选择淡化事件中的政治因素，掩饰其决策的真实原因。王著认为，清、日统治者处理双边关系的方式，在客观上形成了默契，在这样的默契中，双方的“往市贸易”稳定地持续了近200年。这样的分析，确实是先行研究所不曾言及的。

第四，王著自始至终，都潜伏着一条思想史的主线。清朝中国和德川日本虽然没有发生过正面冲突，但正是在这一中日关系的“稳定时期”，日本的知识界开始对来自中国的思想理论进行系统、连续的解构、分析和排拒，在此基础上出现了“颠覆华夷”“争夺中华名分”“质疑、解构朱子学”“变夷为华”等政治底色浓重的思想文化现象。究其原因，是德川政权为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思考和想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空前统一的国家实体，政治经济层面脱出中国中心朝贡体制，对外贸易层面拥有更多的主导权。在此环境中，日本知识界产生了在学术道统层面“去中国化”的“自立”诉求。随着德川社会的稳步发展，上层决策者的意图和知识界的学术思想像齿轮一样相互咬合，构成了一套配合默契的意识形态体系。而德川日本追求“自立”的进程，强化了其自民族中心意识和与中国抗衡的心态，从而对近代以来的中日矛盾起到了前期铺垫的作用。

第五，对“唐船商人”和日本唐通事这些处在清日贸易前沿和基层的群体的相关史料进行了深度整理和分析。这部分史料一般呈碎片化，很难梳理出清晰的叙事脉络，即便整理出各类资料集，也难以被研究者有效使用。王著以清朝的出海许可证、日本的诉讼判决记录、唐通事的身份职务等相关文献为线索，在相当程度上还原了清日贸易的细节，对相关研究具有推进作用。与此同时，王著还对清日贸易数量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整理：将德川幕府对外贸易档案、对外关系史料、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记录、唐通事工作日志以及长崎地方史料等原始文献进行了翻译和整理，丰富了国内日本史研究的基础材料。

来特的勤勉用功，不唯建辉教授和我，所有接触过他的老师和同学，都频发感慨。还在读博期间，他就在《历史研究》《日本学刊》等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取得博士学位并直留任教后，还很快获得了国家

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资助。王来特博士的这部著作，兑现了他当初的庄严承诺。当我们了解到中日关系的横向不睦乃根源于纵向纠葛等历史事实后，我想，了解这部书的读者，比不是知者对中日乃至东亚国际关系的理解和把握水准，将不知会升华凡几。王著中无疑也存在着这样和那样不足，这一方面为来特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这一新的工作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提供了更大的上升空间，也同时促我反思：自己在担任指导教师期间，事实上还有很多做得不够的地方。倘学生们毕业后不责我失职，也就算是对我的奖励了。

韩东育

2018年9月15日谨写于东北师范大学

目录

CONTENTS

绪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起：近世的时间段划分与近世中日的 共通问题	1
第二节 先行研究的回顾与检讨：“朝贡体制论” “朝贡贸易体制论”“互市制度论”	4
一、费正清与“朝贡体制论”	4
二、“朝贡体制论”的修正与批判	7
三、“朝贡体制论”在德川日本对外关系研究中的 应用	10
四、“朝贡贸易体制论”的提出	12
五、有关明代中日关系与朝贡—勘合贸易 之研究	13
六、德川日本对外关系与“互市制度论” 的推进	16
七、近世中日贸易数量以及长崎贸易的 先行研究	19
第一章 明初的对日交涉与“日本国王”的实像及虚像 ...	22
第一节 东亚区域秩序的重建与明太祖的对外政策 基调：“不征”“沮”“绝”	23

第二节	诏令向谁颁：统一的明朝与政权分立的日本之交涉	29
一、	明初对日交涉的特点与难点：对象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	29
二、	“日本国王”怀良的实像	32
第三节	明初赴日使者的多线索交涉	39
一、	《云门一曲》所见赵秩的在日交涉活动	39
二、	滞留“防州”时期的“大明国使”赵秩	44
三、	佛教人际网络与明太祖的“遣僧为使”	47
四、	祖阐、克勤一行在日本的多线索交涉	52
第四节	怀良的“虚像”与明朝的却贡	59
第五节	洪武时期明朝对日交涉原则的确立	67
第二章	明、日“勘合贸易”体制的形成与终结	73
第一节	足利义满与明、日勘合贸易的开始	75
一、	明、日交涉的重开	75
二、	贡期、贡物、回赐与白银、铜钱的流动	80
第二节	明、日勘合贸易的中断	85
第三节	勘合的恢复与日本国书的曲折表述	88
第四节	明、日勘合贸易的矛盾与终结	91
一、	难以为继的“厚往薄来”与日本对铜钱的需求	91
二、	《善邻国宝记》所见“神国”思想的膨胀	95
三、	战国时代的日本与勘合贸易的终结	97
第三章	德川初期日本对中国交涉政策的转变及其区域背景	101
第一节	15至17世纪东亚海域的变动	102
一、	海域贸易网络的形成和多极化	102
二、	明朝对东亚海域的带动及其主导地位的动摇	104

第二节	中日贸易模式的转变	106
一、	丰臣秀吉的“天下一统”及其区域霸权构想	106
二、	“勘合”的变调与中日贸易模式的再构建	109
第三节	日本对中国政策转变的主要因素	111
一、	德川幕府对贵金属开发和输出的垄断及日本货币 制度的统一	111
二、	朱印船的海外贸易	113
三、	贸易对象、交易途径的增多	118
第四节	东亚海域纷争中日本的应对策略	122
一、	平山常陈事件与天主教、新教国家的对日贸易竞争	122
二、	安南的阮、郑之争与日本在区域贸易中的优势	128
三、	柬埔寨与暹罗的争端与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交涉政策	132
第四章	清、日“往市”贸易模式的成立和展开	137
第一节	“锁国”与德川幕府对外政策的调整	138
第二节	后金至清初的对日交涉	143
一、	从努尔哈赤到顺治帝的对日交涉策略	143
二、	清朝商人赴日本贸易的开始	147
三、	清朝海禁时期中日贸易的数量问题	150
第三节	清朝海关贸易的开始与康熙帝对日官方交涉的尝试	155
第四节	德川日本对中国商船的贸易调控：从丝割符制度到正德 新例	161
第五节	日本生产技术能力的提升对贸易主导权的影响：以瓷器 的输出为例	168
第六节	幕府对输出品结构的调控	172

第五章 正德新例的信牌制度与清日政治、经济的博弈	183
第一节 制定正德新例的双重目的	186
第二节 正德新例的实施与“唐通事”的中介作用	192
第三节 信牌的意义：内外有别的解释	197
第四节 康熙帝对日本信牌事件的处理	202
第五节 日本信牌事件在清朝的政治意义	206
第六节 德川幕府对中国交涉的特征与康熙帝的对日交涉策略 ...	209
第六章 清、日贸易中的“唐船商人”	211
引言：唐船贸易与“唐船商人”	211
第一节 唐船贸易对德川日本的意义	217
一、唐船联结起的广域贸易网络	217
二、实物交易外的技术流转与传播	221
第二节 清朝官府出海许可证书所见赴日商人的位置	224
第三节 唐船商人的处境（1）：“信牌”成为清、日双方官府 认可的制度以后	234
第四节 唐船商人的处境（2）：“盈物”及同类盘剥事件	242
第五节 唐船商人的处境（3）：唐人屋敷的博弈	246
第六节 唐通事与德川日本的“怀柔远商”	250
一、唐通事的身份属性及编制	250
二、通事在唐船贸易中的工作	254
三、“怀柔远商”：唐通事群体的政治功能	258
第七节 “武威”与德川幕府对唐船商人的打杀	265
第七章 清朝统治者的多极化世界观与互市的展开	273
第一节 康熙帝对日本信息和区域形势的把握	274
一、“密探莫尔森”的日本情报	275

二、康熙朝官吏对海外情况的把握与皇帝的多极化世界观	278
三、《尼布楚条约》的经验与“多极化世界观”的特征	285
四、徐元梦、马齐与康熙：没有成果的决策层讨论	286
第二节 雍正帝对日本型区域秩序的默认	291
第三节 乾隆年间议禁南洋贸易案再考察	295
一、红溪惨案与“沉默外交”	295
二、议禁南洋贸易奏折内容的再梳理	297
三、海外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301
四、没有官方交涉的“朝贡国”荷兰	304
结语	308
附录 《唐蛮货物帐》(手写影印本)中国商船输出记录整理(节选)	311
参考文献	342
后记	354

绪 论

本书以 14 世纪 70 年代至 18 世纪中期中国与日本的通商关系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这一时期中日交涉体制、贸易模式的建立、演化、解体 and 重新构筑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引发出的政治性问题,分析中日两国间的贸易交涉与各自的国内经济、政治状况之关联,力图从一个侧面勾勒出近世东亚区域秩序变迁的历史轨迹及结构性特征。

第一节 问题的提起:近世的时间段划分与近世中日的共通问题

本书将所考察的时期概括称为“近世”。作为一个历史分期概念,“近世”一词在今天的日本史研究中所指代的主体是安土—桃山时代(1568—1603)以及江户时代(1603—1867),亦即 16 世纪中期至 19 世纪中期,这已经成为通说。^①而在近代早期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界,亦曾以“近世”作为分期概念,其指涉的时段,大体有如下几种说法:1.“自蒙古始兴至今(1890 年代)”说(那珂通世:《支那通史》,东京,中央堂,1888—1890);2.“元初至清道光年间”说(市村瓚次郎:《支那史要》,东京,吉川半七,1895);3.“自清初至现在(1890 年代)”说(桑原隲藏:《中等東洋史》,东京,大日本図書,1898);4.“自宋代开始”说(内藤湖南:《支那論》,东京,文会堂書店,1914)。在西方和日本的双重影响下,中国史学界也曾引入“近世”概念,但所指时段也不尽一致,约有“自宋逮清”(金兆丰:《中国通史》,上海,中华书局,1937)、“从明朝的建立到清朝的灭亡”(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自清室勃兴至衰亡”(王桐龄:《中国史》,北平,文化学社,1926)诸

^① 如新村出编:《広辞苑》(东京,岩波書店,1988,第五版)在解释“近世”作为日本历史的时代区分概念之含意时说:“指江户时代(包括安土—桃山时代)”;金田一京助编:《例解学習 国語辞典》(东京,小学館,1988,第五版)亦说:此词“在历史时代的区分方法中,指中世之后,近代以前,在日本则指江户时代”。

说。^① 据尚小明考察，“从 20 世纪 40 年代初开始，除极个别大学外，‘断代’讲授通史之法已完全取代‘分期’讲授通史之法”^②，作为通史分期概念的“近世”自然也随之而少被使用。^③ 但正如尚小明注意到的那样，20 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界使用“分期”法，除了是“模仿西洋史”之外，其实也“可视为一种试图‘汇通’以观中西历史的大胆尝试”，目的在于“将中西历史对照讲授，以便进行比较”。^④ 就此而言，可以说，当时的史学研究者是从中国史与外国史的关联中，甚或是世界史的视野中，使用“分期”法及“近世”等概念的。本书之所以使用“近世”作为统括性概念，也是基于这样的思路。而本书不简单移用日本史的“近世”概念，则是因为，在笔者看来，无论从世界史（World History）、全球史（Global history）还是东亚区域史（Regional history of East Asia）的角度考察，蒙元帝国的解体和明朝的建立，都标志东亚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无疑可以被视为一个广义上的“近世”的开始。自此以后直至 19 世纪中叶之前的东亚区域秩序，特别是中日之间的贸易交涉模式，虽然不无变化，但更有明显的延续性，是可以作为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段来把握的。也就是说，本书的“近世”，并非中国史或日本史的分期，而是东亚区域史和中日交涉史中在蒙元帝国之后和近代之前的一个阶段划分。

当然，在本书所设定的“近世”这一时段里，中国经历了明朝由盛而衰、明清易代、清朝政权逐步稳定等历史变动；日本则由南北朝分裂到足利幕府的暂时稳定，又经过战国的纷乱，最终进入长期稳定的德川时期。也就是说，本书中所谓的“中日关系”，作为交涉主体的“中”和“日”，在不同的时段，其所指实体是不同的，故此，笔者在把“近世”作为东亚区域史及中日交涉史的分期概念的同时，也会充分注意避免以这一概念抹

①②④ 尚小明：《由“分期”史到“断代”史——民国时期大学“中国通史”讲授体系之演变》，《史学集刊》，2011 年第 1 期。

③ 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室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三版）、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 10 卷（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2）皆收有“近世”词条，但都没有列出该词作为历史分期的概念之义项，这也可以证明“近世”作为历史分期概念的地位在汉语里尚未稳定。

平中日两国各自的历史特性，充分注意这一时期中日两国的朝代更替或政权更迭所带来的双方关系及交涉方式的变化，有效使用而不是废弃中日史学界的“断代”概念，尝试以“分期”和“断代”相结合的方式对这一历史阶段的中日贸易与政治交涉关系进行分析。

另一方面，岸本美绪在研究16至18世纪的东亚历史时，从“当时的世界诸地域面对的共通问题，以及对其进行的不同的回答”这样的观点出发，将中国、日本以及东亚的近世定义为一个“过程”，一个“面对共通的问题各地域各自进行回答”的过程。这些问题包括：如何将存在着宗教、习俗差异的人们进行统合；如何控制市场经济以确保财源；如何对社会的政治秩序进行重组等。^①岸本对近世的定义，无疑为我们依据自身的研究内容划定历史分期提供了一种灵活的方法。而就本书的核心研究内容而言，14世纪后期至18世纪中期的中国与日本所面对的重要共通问题，无疑是以贸易为主线的，其中又包含以下几点：在政治和贸易层面应与对方建立何种关系；在朝贡—勘合贸易终结以后，以怎样的方式进行中日贸易；如何构建自中心的区域政治经济秩序；应将对方置于何种位置又应以怎样的模式进行交涉。

还需强调的是，近世中日贸易，亦可分为多种类型，概言之，至少可以分为政府主导的官方管制型贸易和民间自由乃至秘密走私型贸易两大类型。本书的研究以前者为主要对象，着重考察中日双方政府主导与管控的贸易体制的形成与变化过程，分析其结构性特征，这自然会牵涉到政治性问题。为此，本书在考察双方政府管制贸易的动机、调控贸易的方式时，既注意其在经济利益方面的考量，也注意其在政治利害方面的计算。而中日双方政府在这方面的计算，则既包括如何构建区域政治秩序，如何摆放自身在该秩序中的位置，又包括如何使对外贸易有利于国内的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本书将把这些因素的错综交织、相互作用放入考察的范围，并

^① 岸本美绪：Rethinking “Early Modernity” in Chinese History，见《北京论坛（2005）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全球化视野中亚洲的机遇与发展：“历史变化：实际的、被表现的和想象的”历史分论坛论文或摘要集（下）》，2005年11月。

努力提出恰当的解释。

此外应当注意的是，近世中日之间的贸易和政治关系，不能仅仅理解为局限在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两国都关注所处东亚区域内其他国家、政权或势力的兴衰更迭，注意在多边的力量及利害关系中审时度势，并据此对中日之间的交涉方式做出调整或改变。为此，本书将把东亚区域特别是东亚海域作为重要的背景因素，尝试从更广泛的区域网络里分析近世中日经济与政治的交涉模式及其变动的原因。

第二节 先行研究的回顾与检讨：

“朝贡体制论”“朝贡贸易体制论”“互市制度论”

本书所涉及的相关先行研究，在中国史和日本史的研究领域里多被分解在双方“国史”的“断代”研究中，如中国的“明代”和“清代”研究，日本的“南北朝时代”“室町时代”“战国时代”及“江户时代”研究等。然而在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层面，与本书内容联系最紧密的无疑是有有关前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和东亚国际关系的“朝贡体制论”“朝贡贸易体制论”，以及“互市制度论”的研究。故本节以此作为主要的考察对象，同时亦对其他方面的相关研究进行适当梳理，并将之整合到本书的论述脉络之中。而在对先行研究进行整理的同时，自然会参入笔者的分析和判断，在此意义上，本节也可说是对本书问题意识的初步阐述。

一、费正清与“朝贡体制论”

“朝贡体制”（Tributary System）^①，是当代研究者在讨论前近代中国对外关系以及东亚国际关系的历史时设定的一个分析概念^②，曾长期被视为

① “System”在汉语脉络里被译为“体系”“制度”“体制”，本书在引述（无论直接还是间接引述）相关文献时，将尊重所引文献的译法，而作为本书的分析概念，则主要使用“体制”。

② 马克·曼考尔曾指出：“研究者必须时刻牢记，‘朝贡制度’这个概念是为便于描述而创设的一个词。中国的士大夫不认为朝贡制度（汉语中原本没有对应词）是自成一体或者有别于儒家社会其他制度的一种综合性制度。”参见[美]马克·曼考尔：《清代朝贡制度新解》，见[美]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5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在此姑且不论曼考尔对“中国士大夫”带有偏见的判断，仅就“朝贡制度”这一概念的创设而言，他的提示是值得注意的。